

国际 NGO: 社会公益慈善解决方案在被帮助者那里

前沿观点

发展公益别泛道德化

近期,施乐会因为捐款提成机制消息被爆出,遭遇了大面积的批评。当主流网络舆论倾向指责施乐会的同时,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观点超越了纯道德的指控,从公益行业的正常发展来理解这一现象。

面对施乐会的提成机制,这一行为首先没有违反刑法。而乐捐好施本身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当然施乐会规定捐款可提成与“100%到达受助人的手中”的口号有冲突,但是捐款人在明知会有提成前提下还愿意捐款,则是本身就认可了这样的机制。

公益慈善机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用规模运作的优势和职业的团队救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公众认同这些机构的价值理念,但是缺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将资金捐给在公益理念和操作能力上最匹配的团队,无疑是对全社会都最有益处的方式。

但是,现在面对公益信任危机一个矫枉过正的趋势,就是公众过多用道德的眼光来看待机构管理和运作的过程。在对施乐会的讨论中,这家机构为何而立,他们究竟帮助了多少人鲜有被提及,而所有的眼光都聚焦在捐款提成这一点上。而这种方法是否带动更多捐款帮助更多的受益人,又被忽略。

而在技术上来讲,公益捐款提成是公益机构如何最大化地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方法。在符合机构发展理念、国内公益行业发展不成熟和不违法的前提下,这个工作方法没有对与错的问题,只有是否有效的问题。什么样的促进捐款办法最有效,提成是否更有效,比例该是多少,都是可以探讨的技术问题。如果过早地运用道德批判扼杀一切技术改进,因循守旧,公益事业又如何能够前进? (赵奋)

公益行为更应讲究效率

近年来,关于公益慈善组织的负面消息不少,如今被广泛质疑的“募捐提成”,其实也不算什么新闻,只是“慈善管理费”换上的另外一个马甲而已。中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国内公益慈善机构据此一直以来都有在捐款中提取10%的“管理费”的“明规则”。只不过在劝捐过程中,相关组织很少开门见山地向公众说明清楚,让人感觉有“坑蒙拐骗”之嫌。

事实上,早在2004年,湖南省曾出台《湖南省慈善总会组织社会力量募集资金办法》,其中规定,为了调动社会募集者(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积极性,同时考虑到社会募集者需开支差旅费、通讯费、交通费等,劝募者可从所募集善款中得到8%至15%不等的劝募提成。由此看来,所谓的“募捐提成”并非个例,可以说在业内已相当普遍。甚至在NGO更为发达的西方国家,执行性的公益组织行政经费超过20%、30%的也并不少见,但前提是其财务报告、资金去向能够让公众信服。

其实,募捐能否进行“提成”并不是最关键的,更重要的是公益的执行效率问题。如果在募捐前通过事先声明的方式提取一定的费用作为正当的执行成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必须保证其余善款百分之百用到实处。相较于一般企业与机构,公益慈善组织更应“流着道德的血液”。在当下公民观念复苏、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背景下,公众可以“用脚投票”并大声说“不”。时代在进步,倒逼着公益事业向前迈进。(周欢)

工作问答

1. 什么是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

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就是当一个人在不幸去世时,将其功能良好的器官,以自愿、无偿的方式,捐献给人国家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用于器官衰竭患者的治疗、延续生命,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是指面向社会公众在其身故后自愿的器官捐献,不涉及活体器官捐献。

2. 人体器官捐献自愿登记需要什么条件?如何办理?

本人需要知道几件事情:1. 本人有身故后捐献器官的意愿;2. 了解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的一般情况和流程;3. 其主要亲属支持他(她)的决定;4. 无恶性肿瘤、无艾滋病等严重传染病,年龄在65岁以下。如果上述条件都具备,可以联系全省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

但最终还是能够捐献,需要下面几个条件:

1. 经医学评估专家判定生命确实已经无法挽回;2. 患者的器官适合捐献;3. 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等主要亲属等一致同意捐献;3. 一个人若签了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一旦遇上意外,医护人员是否会放弃救治?

绝对不会。拯救生命是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天职,器官捐献只有等所有抢救措施都失败,医护人员与病患家属开始讨论死亡时,才会被提出。所以曾经表达过器官捐献的意愿绝对不会影响到应有的救死扶伤的医疗宗旨和服务。

4. 体弱者是否可以捐献器官?

人体器官捐献一般要求年龄

小于65岁,主要视捐献器官的可用性而定。原则上,有关器官功能良好,没有感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没有癌症(除原发性脑肿瘤)者,一般都适合捐献器官。最后,只有当评估组织的专家确认器官适合作移植后,才会进行手术。

5. 捐献者或者亲属只愿捐献某一种器官,其他器官会被摘取吗?

人体器官捐献自愿者,可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上表明自愿捐出的器官种类。此外,在捐献手术进行前,捐献者亲属需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并再次明确捐献的器官或组织,医生会严格按照捐献意愿获取器官。

6. 是否可以指定捐献给某位特定人员?

人体器官捐献是大爱的表现,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移植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如组织抗原基因(HLA)的类型、血型以及等待者病情的缓急程度等,谁最适合,应根据器官分配原则来确定。

7. 器官接受者或其家人是否会到捐献者家中进行致谢或慰问,导致捐献者亲属更加伤心难过?

基于尊重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的隐私,捐献者和接受者的基本信息都会严格保密,医护人员不会透露双方姓名或个人资料,以避免当事人不必要的困扰。如果捐献者和接受者双方需要,相关工作人员会告知捐献者家人有关器官接受者移植手术后的进展,并且可担任“捐”和“受”双方的联系,传递关怀。除非亲属同意,我们不会将该项捐献的消息主动发布给新闻媒体。

(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供稿)

当然,所有类型的人都很重要,都会对社会有所贡献。人们被鼓励,从而具有创造性。如果他们被告诉说,即使犯错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分享你的信息,并改正错误。这种方法对我们很有效,这是我们得到创造力的原因。这不是说,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我们能把事情做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很清楚的大纲和原则,这非常重要。而且,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总是试着尽可能地接近我们服务的人群。我们相信城市和社区一线的人胜于坐在总部里说应该这样或那样做的人。如果仅仅是外国人带着自己的主意,那么这些想法将无法在他们服务的社区获得成功,或者说非常难以成功。

《21世纪》:听起来你们允许人们犯错? Paul:是的。组织如果不犯错,是因为努力得还不够。这并不意味着会频繁犯错,也不是我们对此不重视,但我们总是要找新的方法和更好的方法来做事情,所以总是要尝试新的事情。这是一个发现之旅,你知道,第一次你并不一定能够登上山顶。但你需要知道在你遇到灾难之前什么时候该停止。

《21世纪》:你似乎对此深有体会,能给我们一些个人具体的相关经历吗? Paul:例如你在和一个索马里的农夫谈话,这个农夫比任何人更了解他的土地,他也有可能知道解决方案。你需要发现在他们脑中已有的解决方案,已有的知识,寻找方式鼓励他们改变。通常他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但一直没有获得改变事情的机会。没有人比社区的人更了解自己。他们往往知道答案。你需要给他们的是机会,而非答案。问题的解决之道

《21世纪》:非盈利组织总是要面临很多新挑战、新问题,如何让组织更具有创造力? Paul: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部分因素是你所雇用的人的特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看,有的人生下来就很有探险精神,有的人则生来保守,按常规做事。

织都可以竞争。政府为什么给你钱呢?因为他们看到你想法的价值。你带来新的想法、新的能力,帮助政府来达成他们的目标。不是政治目标,而是帮助人们摆脱贫穷,覆盖灾难、战争的损失,类似这样的目标。衡量我们项目是否成功的,不是华盛顿或者伦敦的人,而是巴基斯坦这些地方的人们,他们是我们的客户。另外35%的资金从民间的个人或者组织获得,不那么稳定,但能让我们可以试试一些新的主意。我们总是充满新想法,大部分奏效,有一些不一定,我们从错误中比正确中学习更多的东西。

《21世纪》:我想问一个在中国很热的问题—公益慈善机构的经费来源。美慈的经费来源是哪里? Paul:我们65%的资金来自政府,比如美国政府的US-AID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国际发展服务部),或欧洲政府、挪威政府等。这些资金无关政治,给我们的这些钱是基于某些基础,而不是合同。我们不接受从政府而来的一些合同,比如政府说要这样或者那样做。相反,政府会就某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比如苏丹的贫穷问题,巴基斯坦的健康问题。你告诉政府你将如何解决问题,而政府像一个同伴,资助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让自己保持政治独立。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是我们的焦点,是我们要服务的客户。

《21世纪》:政府为何给这么多钱?另外35%来自哪里? Paul:政府的资金就在那里,比如美国和欧洲政府,所有的非政府组

被帮助者知道解决方案

《21世纪》:政府为何给这么多钱?另外35%来自哪里? Paul:政府的资金就在那里,比如美国和欧洲政府,所有的非政府组



送爱心进学校

9月3日,黄岩区红十字会联合黄岩第二高级中学团委及区慈善义工来到宁溪小学,为一年级小朋友们送上文具盒和图书等作为开学礼物。此次爱心活动所有文具都是由该区红十字会等单位通过开展爱心募捐活动募得,募捐善款则全部用于购买图书。 蔡步文 摄

伦敦奥运会:为公益慈善机构与全球品牌架一座桥

8月13日凌晨,伦敦奥运圣火徐徐熄灭,从此,我们的目光开始追寻这届奥运会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伦敦奥运会举办地所在的四个城区均被“伦敦信託(Trust for London)”组织列为贫困城区,这里是全伦敦住房、薪金、医疗和教育水平最差的区域。就在那里,一个月以来,向世人展现了一个荣辱交织的世界——异彩纷呈的奥运赛事和当地民众的艰辛生活。这两者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两年前,伦敦政府找来了9家富有远见并着解决当地困难的公益慈善机构,他们都希望以商业技能来弥补自身发展中的弱项。通过配对,来自5家奥运会赞助商的商业领袖们以分组的形式,每月定期为他们进行技能辅导,为期一年。这5家赞助商分别为阿迪达斯、英国石油(BP)、英国电信(BT)、莱斯 TSB 商业金融公司(Lloyds TSB Commercial Finance)和德勤。 现实不甚乐观。在与赞助商合作

期间,所有这些机构都正在经历或已经遭受了政府的财政削减。“青年新选择(New Choices for Youth)”有着25年与儿童和青年人共同解决生活困难的经验。去年,该组织支援了1500名纽汉(Newham)和陶尔哈姆莱茨(Tower Hamlets)区的青年。然而,2010年的政府财政削减让该组织的资助从120万英镑骤降至50万英镑。另一家关注家庭暴力的公益慈善机构Aanchal则失去了所有来自当地政府的补贴。

在公益慈善界一直存在公益慈善团体是否真能从商界获取知识和这种做法正确性的争议。但对于小型的公益慈善机构来讲,有一群商业头脑在一旁帮助和指导他们解决棘手的问题,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只是,这其中不免发生许多摩擦。在最初的交锋阶段,公益慈善机构很难抽出身来,在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另一方面,来自大企业的人也很难适应一个预算极小并没有严谨董事会结构的团体。

对这其中大部分的公益慈善机构来说,这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但正如“青年新选择”的负责人玛西亚·塞缪尔(Marcia Samuels)所说,尽管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她现在清楚地了解机构的所有开支并怀揣一个清晰的商业方案,机构也正因此变得更加流线和专业化。许多团体还努力达成富有雄心的目标。“体育之路(Access Sport)”组织的马克·哈迪(Mark Hardie)表示他们正有条不紊地向他们的目标迈进——为9000名贫困地区的儿童提供高质量体育设施的接触机会。

到2013年,当所有的公益慈善机构与企业导师的合作期满时,伦敦期望这些机构将使其服务受众扩大一倍,财政收入增长50%。“体育之路”组织就正朝着这个希望进发。然而,从这个过程中受益的不仅是公益慈善机构。对于许多来自企业的导师,这些小型机构每日与艰难困境的斗争也让他们上了一课。英国电信的一位导师说,这次经历让她学会了

“从另外一个视角观察这个世界”。而另外一位原本就出身于沃尔瑟姆福里斯特(Waltham Forest)区的高级执行官就深深感受到了帮助自己街区所带来的好处。

将企业与公益慈善机构这两个世界拉到一起的关键是“尊重”一词,各自世界都有能够向对方传授的知识。此外,这需要时间,需要一年的时间让彼此充分了解对方的拳拳之言。然而,最终证明,这两个世界都非常享受这种融合。

当下的挑战在于要向全英和全世界的企业发出这样的信息:当你们在经历了日间的商场厮杀后,在夜晚,回头看一看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今,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呈现主题化和全球化的态势,大企业有必要为民间的公益慈善机构腾出一些思考的空间。我们需要企业找寻和聚焦当地社区和活跃于其中的慈善机构,与他们联手做出改变。这个必要性不应该动用一届奥运会来证明。